办好文旅融媒体的三个“锚点”

郭 嘉

在各地文旅的融媒体建设已基本完成机构整合与渠道布点,账号矩阵与采编流程大体齐备的情况下,当前的问题往往不在渠道多寡,而在内容的生产逻辑未随之调整:不少账号发布的,仍是传统通稿的平移版本。将这一现象归因于“语态生硬”,只触及表象。更值得追问的是,这类内容尚未确定自身的服务对象——同一篇稿件同时面向本地居民、拟出行者、潜在游客与行业从业者,实际上难以对任何一类对象形成有效供给。

从工作成果转向使用需求

文旅信息的网络消费多发生于决策环节:目的地选择、时间安排、交通方式、同行适配、天气与备选。这类需求指向明确,且有时效,要求信息以“问题—答案”的方式组织。而通稿的组织轴心是“工作—成果”:做了什么、有何成效、意义何在。两者并非文风差异,而是组织单位的差异。对此,融媒体内容建设的重要任务,是把以工作成果为单位的供给,转为以使用需求为单位的供给。其前提是建立选题与业务部门之间的信息通道——大量未被回答的问题,并不缺表达,而是缺一手信息。

受众亦非同质群体,拟出行者需要线路、时段与容量信息;在场者需要即时提示与分流引导;未到访者需要形成到访理由;本地居民关注的则是活动与自身生活之间的关联。四类需求对应四种内容形态;以一条综合性稿件覆盖,往往全面而失焦。

语态问题的实质是可读性与可操作性

讨论语态,容易停在措辞上。不少账号的调整办法,是把“隆重举行”改成“如期举办”,把陈述句改成感叹句,再配上几个表情。这类改动解决的是语气,不是阅读成本。语汇会过期,去年时兴的说法,今年已经显得旧;时间、地点、预约方式这类信息,什么时候都有人需要。受众在手机上读一条文旅信息,费力之处在信息的位置:如果结论押后,几点开始、怎么预约散落在背景里,读完仍不知该怎么安排。可读性取决于结构而非措辞,通行的处理是结论前置、要件独立、背景后置。

可操作性指受众能据此行动,也包括情况变化时能得到更正。信息发布之后,受众通常还有追问:是否如期、有无调整、是否仍然有效。追问出现在评论区,也出现在现场;这样一来,信息就不能止于发布。

权威性建立在可核验与可兑现之上

不少从业者有一个顾虑:贴近受众就要放低姿态,放低姿态就会损失权威。这个顾虑把权威当成了语气问题。融媒体环境下,权威取决于两件事:信息能否被核验,承诺能否被兑现。表达方式可以调整,事实要素不能松动。开放时间、票价、预约规则、临时调整,一处出错,长期积累的公信力便会折损。反过来,一条把场次、停车与雨天预案交代清楚的内容,即便文风平实,也会因可靠被转引。

文旅融媒体还有一个其他垂类少有的条件:内容与线下行为直接相连,受众可能因一条信息出行、消费并二次传播。因此,评价不宜止于阅读量与转发量,还应看它是否推进了实际行为:完成决策、顺利到场、获得体验、形成再访意愿。流量是结果之一,不是目的。

正向性也应照此衡量。它不取决于稿子里出现了多少积极表述,而取决于受众能不能把信息用上:出发前知道该期待什么,到场后遇到的与说的相符,情况有变时有人回应。只报结果、不答疑问,短期或有声量,长期则损耗信任。

机构整合解决的是渠道问题,内容生产要解决的是对象问题。由发布转向回应,由告知转向服务,有利于文旅融媒体效能的进一步释放。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化产业系主任、副教授)

文旅评驿工作室

以红色文旅为载体促进高校思政教育模式创新

龙叶敏

以红色文旅为载体的高校思政教育模式,需要教师挖掘革命旧址、纪念馆等红色文旅资源,让思政教育能够走出课堂,通过实地研学、探索体验、实践落实等方式,构建多元化、场景化的思政教育形态。在推动思政教育创新优化、融入红色文旅体系的过程中,教师既需要凸显思政理论的引导作用,也需要设置丰富的实践活动,让学生能够在鲜活的历史场景中了解理论的重要性,并在实际的沟通交流和实践中将思政知识内化于心、落实于行,从而起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拓展思政育人路径的作用。

结合思政需求明确红色文旅路线

在以红色文旅为载体促进高校思政育人模式创新时,教师要在课堂教学中结合思政教学需求、目标,明确红色文旅路线,引导学生做好实践学习的准备。该策略要求教师在全面分析思政理论知识架构、逻辑脉络的基础上,挖掘当地与教学相匹配的红色文旅资源,筛选与教学内容相匹配的关键经典,从而形成逻辑连贯且主题鲜明的红色文旅路线。其作用在于进一步转变传统课堂教学的局限性,使教师能够通过预先设计的文旅路线,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具体可感知的现实场景,并在课堂中与学生进行交流,对文旅路线进行优化,比如鼓励学生调整景点顺序、推荐其他景点等,实现学生生活经验与思政知识的融合。同时,在设计红色文旅路线时,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通过文献查阅、问题清单拟定等准备工作,让学生做好准备,真正做到带着理论知识投入文旅研学中。

在推动文旅路线设计落实方面,教师需要从路线分析引导、师生深度协商、提前做好准备三个环节入手。首先是路线分析引导环节,教师在上课前应当提前发布红色文旅路线图和相关的教学内容,并设置“该场馆所承载的精神与课堂哪一章节内容最契合”等问题,促进学生主动了解相关故事,并实现事件、文旅目标和理论知识的匹配。在课堂教学环节,教师需要与学生研讨文旅路线优化方案,比如鼓励学生提出新的展馆等,或者引导学生提出自己感兴趣的文旅目标,以及探讨参观时长,若学生存在与教学目标不匹配的建议,教师则需要明确取舍理由,保障文旅路线和教学目标始终保持一致。在准备方面,教师则需要让学生准备好资料、工具以及理论方向,比如展览和群众路线的关系等,让学生能提前做到思政理论与红色文旅活动之间的融合。比如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思政实践课程设计方面,根据当地优势打造了“‘一线串四城’:胶济铁路上的抗战记忆”主题思政研学活动,整个活动以胶济铁路作为研学主线,串联了济南、淄博、潍坊和青岛四个城市中多个历史遗迹以及与胶济铁路和抗战相关的展馆。为保障活动顺利进行,教师在文旅研学活动开始前,制定了完善的课堂导入方案,通过史料分析、文物实物观察等方式,让学生了解相关历史故事,确保学生能带着深刻的理论深度融入后续的活动中。

推动红色文旅研学活动组织落实

在推动红色文旅研学活动落实方面,教师应将路线转化为具体可操作且具有深度的研学活动,确保在活动精心设计的环节中实现思政理论的自然融入。为此,教师需要在完成实地探查后,与红色文旅场馆或景点负责人一同设计丰富的活动形式,比如在纪念馆内组织主题交流会、在遗址现场开展微型辩论会、在红色景点内组织沉浸式演出等,充分发挥景点资源优势,并将其转化为灵活的思政育人素材。该措施的作用在于,能充分发挥红色文旅研学活动的育人功能,在避免“走马观花”的基础上,让学生能够在每个活动环节感受思政知识的内涵,以此引导学生从看见历史到理解精神再到信念内化的层层递进,实现思政课堂的有效延伸与深化。

在实践落实中,教师需要根据不同阶段制定多元化的活动。在入场阶段,教师应提前与相关管理人员进行沟通,明确活动区域和时间段,确保有足够的研学空间和时间;在此基础上,教师需要向学生发布研学任务目标,明确各环节思考方向,比如在参观某战役纪念馆时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仍能取得胜利”等问题,确保学生能带着问题进行参观和思考。在研学进行过程中,教师需要摆脱单一的讲解参观模式,应根据具体案例提出相应的问题,比如“群众路线在本次战役中如何体现”“艰苦奋斗精神在当代是否过时”,并要求学生进行小组讨论以及观点辩论,配合教师的现场点评实现理论升华。在离场后,教师需要布置返程任务,引导学生结合研学见解撰写分析报告,可以在下节课进行成果展示,实现思政理论的全面融入。

以重庆第二师范学院为例,在组织红色文旅研学活动中,学校构建了“五维赋能”育人体系,在组织学生走进红岩革命纪念馆、渣滓洞等红色场馆开展现场思政课的同时,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进行研讨交流和心得分享,让学生在交流中实现对红岩精神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的深度理解。

组织文旅志愿活动,深化学生社会适应性

文旅志愿活动则要求教师与红色文旅景点和场馆进行合作,构建志愿服务平台,让学生在真实的社会服务场景中强化沟通协调、应急处理、团队协作等综合能力,同时也能在红色文旅的环境下,通过讲解红色历史、传播革命精神实现思政理论的内化。该阶段的核心在于,让学生从被动接受教育,转变为服务与传播的角色,在志愿服务中深化对理论概念的理解和认同,确保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在志愿活动组织落实时,学校首先要与相关单位进行对接,明确志愿服务的要求和岗位,并由专业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要求学生了解景点或场馆的历史背景、思政内涵,以及所需要落实的志愿内容、礼仪规范。比如在讲解培训中,教师和工作人员需要让学生思考“为什么要讲”“讲给谁听”“怎样讲得吸引人”等问题,让学生的实践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在志愿服务环节,教师则需要根据场馆或景点需求,以及学生的爱好、特点、意愿进行分配,比如需要锻炼表达能力的学生可以担任讲解员,为参观者讲述革命历史故事,以此深化对革命历史的理解;需要强化实践能力的学生,则可以承担参观引导、客流疏导、咨询解答等基础服务工作,让学生在内化“为人民服务”等理念的同时,也能提高沟通能力与应变能力。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定期换岗等方式让学生的能力得到综合锻炼。在志愿活动结束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撰写心得,并做好系统性点评,确保学生的志愿经历能内化为自身的思想与行动。

以黑龙江外国语学院为例,学校组织国际和平社团学生进驻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常态化志愿讲解服务。在志愿活动前,学生接受了系统性培训,对场馆内容、历史脉络、思政内涵和讲述技巧进行了学习,在实现思政内化的同时,也让学生的表达能力、临场应变能力得到了全方位提升。

结语

综上所述,为充分发挥红色文旅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载体优势,高校教师需要深度挖掘当地丰富的红色文旅资源,结合思政教育的目标和需求明确红色文旅路线,并通过组织和落实文旅研学活动、组织文旅志愿活动等措施,让学生能够在红色文旅历程中深化对思政知识的理解与践行,为促进学生思政素养的提升与内化筑牢坚实基础。

(作者单位:西安翻译学院)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育人功能的深度开发与实践转化探析

陈 碧

广西是红军长征的重要转战地和湘江战役的主要发生地。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发扬。立足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系统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育人功能的深度开发,扎实做好从“历史现场”到“思政课堂”的实践转化,对于赓续红色血脉、培育时代新人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深挖内涵:从湘江战役中提炼精神内涵,阐释其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惨烈、最悲壮的战役之一,形成“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深刻精神内涵。其中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深厚家国情怀和崇高道德品格,与高校思政课程的育人目标高度契合,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教材。

从湘江战役中提炼精神内涵,有助于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血战五昼夜,撕开敌军重兵设防的封锁线,其中蕴含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依托湘江战役红色资源开展思政教育,能够引导大学生从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中汲取精神力量。

从湘江战役中提炼精神内涵,有利于厚植大学生家国情怀。全州、兴安、灌阳三地湘江战役沿线纪念设施,直观展现红军将士为革命事业浴血奋战的壮烈历程。将湘江战役红色资源融入思政课程,能够让大学生在回望历史中感悟家国大义,自觉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

从湘江战役中提炼精神内涵,有利于涵养大学生道德品格。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的崇高品格,为当代青年树立了重要的精神标杆,能够引导大学生培育自身良好德行。

筑牢底座: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为思政教育提供重要载体

在传承赓续中激发红色资源的生命力,要让红色记忆更多地“被看见”。从零星遗址到串珠成链,红色教育有了可触摸的物理空间。2019年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启动之际,桂林即成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统筹当地湘江战役红色资源保护、研究等工作。公园以红军长征过广西的史实为基础,围绕血战湘江、翻越老山界等历史事件,沿线覆盖桂北六县,一条红色文化走廊由此铺展。以“三园三馆”为核心,纪念设施持续提质,并建成连接大坪渡口旧址等7个重要历史点位的红色文化展示项目(一期)。在界首渡江遗址公园东岸,建设兼具研学实践与思政教育功能的“湘江书院”。

在夯实载体的基础上,同步加快数字化建设,形成随时可学的教育新生态。打造“红色·桂林”网站,集图文展陈、音视频讲解于一体,率先上线兴安突破湘江纪念馆虚拟现实全景展馆。精心制作“AI+手绘”的数字长卷,开启沉浸式导览,720度全景技术带领参观者身临其境地“走进”湘江战役的烽火现场。全州县的“云上长征”,实现手机端微党课和虚拟现实导览、电脑端数字展馆集群、大屏幕全息影像剧场的三联动。

守正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赋能高校思政课的探索与转化

立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区内高校思政课改革有了更多实践场地与鲜活教材。围绕这些资源,各校探索出各具特色的思政课形态。

(一)共建“场馆里的思政课”。广西师范大学等高校与桂林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签约,挂牌实践教学基地,定期组织师生到场馆深入学习。专职红色讲解员和志愿讲解员常驻各个场馆,面向研学学生承担现场教学任务。多元化讲解与思政引导共同作用,既讲故事也讲道理,让信仰的种子落地生根。

(二)打造“行走的思政课”。依托研学深化行动成果,高校师生纷纷将桂林红色旅游巴士专线当作移动课堂,采用“专线+研学+实践”模式,围绕“一天一县、一县一魂”的主题开展徒步遗址、重走故道、祭扫烈士墓等活动。师生在大坪渡口感受渡江之险,在25公里红军绿道上体会长征之艰,边走边学,研有所悟,行有所获。

(三)创新“数字化的思政课”。数智技术与思政教学加速融合。南宁师范大学团队围绕湘江战役历史细节反复考据,将战争进程转化为清晰的数据图谱与可视化素材,开发出一批兼顾思想深度、技术呈现与实践应用的教学资源,并陆续在7门思政课中投入使用。“桂林红”研学云平台与虚拟现实场景协同联动,设计大学生红色主题思政课实践教学案例,构建起线上线下融通的教学闭环。人工智能生成的湘江战役场景复原、数字人讲解及互动问答,则为日常思政课堂增添沉浸式体验,显著提升了教学的感染力与参与感。

(四)编演“剧场版的思政课”。鼓励学生围绕湘江战役自编自演,把课堂改造成剧场。舞剧、话剧、短剧竞相登台,一批原创作品脱颖而出:广西师范大学推出《战湘江》、桂林旅游学院献上《血色湘江》等。当学生换上戏服、走进角色,他们不再是被动的听众,而是历史的“在场者”,实现了文化滋养与价值引领的自然融通。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育人”“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经过持续建设,桂北六县的遗址、场馆与山水已串联成“没有围墙的思政大课堂”。面向未来,应进一步深化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成果的育人转化,用“场馆里的思政课”铸魂,在“行走的思政课”中砺志,以“数字化的思政课”润心,与“剧场版的思政课”共鸣。引导广大青年从湘江战役的壮烈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在学思践悟中走好新的长征路。

(作者系桂林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让工匠文化“长”在校园里

——部分职业院校校园文化育人“悬浮化”倾向及其破解之策

郝 艺 张 璇 阚晓萌

部分职业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常陷入“悬浮”,标语上了墙、活动上了报,却未进入课程、制度与学生的日常行为。这类校园文化建设的通病,是在最上层做文章,把可见的部分做得很足,却不动课程、制度和日常行为这些深层结构。由此看来,文化育人要解决的不只是“有没有文化”的问题,更是“文化有没有进入育人流程”的问题。这个流程可拆成四个方面:资源能否课程化,即把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课程与学理;空间能否场景化,即把空间景观转化为教学场景;活动能否制度化,即把活动仪式转化为制度惯例;认知能否习惯化,即将相关认知沉淀为可观察的行为习惯。把这四个方面做好,有助于文化育人的进一步落地。

资源课程化,让文化资源进一步融入学理

地方文化资源不会自动变成教育资源。名人故里、非遗技艺、行业传统,只是“素材”;要成为“课程”,需要经过选择、编码与教学法处理,明确谁来教、教什么、怎么考。缺少这道转化,文化资源就只能停在参观和讲解上。

这一转化往往需要长周期的学术积累。黄炎培1918年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敬业乐群”的校训、“手脑并用、双手万能”的理念沿用百年。历史资源由此变成课程、课题与教材,成为可教可学的东西。张謇在南通创办纺织专门学校,把“父教育而母实业”的主张落进车间,走的也是同一条路,先有学理,后有传承。

高职院校应充分利用地域文脉,编写校本教材、开设校本课程,成立研究机构,把工匠精神纳入思政教学与“匠德”训练。这一步看似最慢,却决定了后面的场馆与活动有没有“魂”。

空间场景化,让环境进一步参与教学

场馆建起来只是开始。判断环境文化是否做实,有一个朴素标准:学生在其中看到的是成果陈列,还是工艺过程与操作标准。前者是荣誉室,后者才是课堂的延伸。环境是一门不开课的隐性课程,学生与空间的每一次照面,都是一次无声的教学。

比如,枣庄职业学院工匠文化博物馆面积约2000平方米,设匠物、匠人、匠技、匠制、匠心、匠承6个展区。学校统计,完成一次研学体验后,87%的学生能结合本专业谈工匠精神,近六成学生主动报名工匠社团与创新工作室。这组数字的意义不在比例本身,而在于它提示,当展陈呈现的是工艺过程而非荣誉证书时,环境能够直接改变学生的行为选择。

从现实来看,不少院校的展馆建成后使用率不高,原因往往是没排进课表、没有学时、没有教师在场。场景化的关键动作其实很具体,把场馆写进人才培养方案的实践环节,配上讲解与任务单,让每次参观都有产出。

活动制度化,把好做法沉淀下来

活动与制度的区别,在于能否沉淀。一场比赛再热闹,散场即归零;预算、课表、考核3张表,才是文化从“活动”变成“惯例”的通道。钱花在哪里,考核表上有什么条目,比标语更能说明一所学校真正看重什么。

制度还有一个功能,把偶然的好做法制度化,人员更替之后仍能按既有轨道运转。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培育写入法律要求,为制度供给提供了重要依据;今年,我国《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27个新专业。专业标准与职业标准的对接,本身就是制度化的入口,文化要求一旦写进专业教学标准、实习规范和技能评价,就不再只是依赖个人的热情。

高职院校应把工匠精神培育写入人才培养方案,将“匠德”纳入学生考核,可以设专项资金与督查机制,并把更加完善的管理机制引入实训室,进一步实现工具定置、流程上墙。制度替文化“站岗”,靠的不是号召力,而是约束力。

行为习惯化,让成效可被进一步检验

文化育人需要看行为。然而,节庆上动作标准、平日里另是一样,是常见的失效方式。这就需要把文化要求翻译成可观察、可计量的动作:工具是否归位,图纸是否按标准标注,交接班记录是否完整等。这些细节比很多汇报材料都诚实。

从“知道”到“做到”之间隔着习惯。习惯的养成依赖两个条件:重复的场景与即时的反馈。实训室按车间逻辑布置、工序卡随件流转、师傅当场纠偏,都是把文化要求嵌入日常动作的技术手段。高职院校可以把文化要求列成能力清单,再以工匠文化节、入企教学、现代学徒制作为固定载体。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往往也落在这些细节上,技能可以短训,习惯很难速成。

建立和完善相关机制

一是建立“文化—课程—学分”的转化机制。把地域文化、行业传统、企业标准转化为模块化课程与实践项目,纳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并赋予学分,明确师资与考核方式,使文化内容获得与专业课同等的教学地位。

二是建立“场馆—课表—学时”的使用机制。将博物馆、体验馆、大师工作室纳入实践教学计划,规定各专业必修学时,配套任务单与成果评价,避免场馆沦为参观景点。

三是建立“区域—行业—院校”的协同机制。依托市域产教联合体与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共同开发文化素养标准与课程资源,开展跨校比较与数据监测,形成可复用的经验,而不是各自为战的经验总结。

文化育人是慢变量,其成效往往要在学生毕业若干年后才能显现,这也提醒我们,少一些即时性的成果盘点,多一些长时段的跟踪。职业院校是离工匠文化最近的育人现场。把文化做进课程、做进制度、做进学生每天的动作,能够让工匠精神的传承更加有着落。

(作者单位:枣庄职业学院)